

皇侃哲学思想研究

张 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皇侃哲学思想研究

张 波◇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侃哲学思想研究/张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7089 - 2

I. ①皇… II. ①张… III. ①皇侃(488 ~ 545)—哲学
思想—研究 IV. ①B23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45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二 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检讨	(3)
三 研究方法与思路	(7)
第一章 皇侃生平、著作及学术背景	(9)
一 皇侃生平及著作	(9)
(一) 生平	(9)
(二) 著作	(12)
二 皇侃思想形成的学术背景	(17)
(一) 自由阐释的学术风尚	(18)
(二) 多维互摄的学术实践	(23)
三 《论语义疏》的阐释特征	(30)
(一) 体例与语言	(30)
(二) 思维方式	(42)
第二章 性论	(55)
一 性的内涵与特征	(56)
(一) “性者,生也”	(56)
(二) “性无善恶,而有浓薄”	(68)
(三) “人生性分各有所能”	(71)
二 “性”、“情”之关系	(82)
三 “性”、“命”之关系	(90)

第三章 仁论	(98)
一 仁的本质	(99)
(一)“仁者,人之性也”	(99)
(二)“仁者,恻隐之义”	(102)
二 为仁实践	(105)
(一)“约俭己身”	(105)
(二)“仁是行盛”	(109)
三 为仁功效	(117)
(一)圣王(圣师)的仁功	(117)
(二)君子的仁功	(120)
第四章 孝论	(127)
一 孝的本质与地位	(127)
(一)“孝是仁之本”	(128)
(二)“孝为百行之本”	(130)
二 “孝是事亲之目”	(133)
(一)无违为孝	(133)
(二)以爱、敬为孝	(134)
(三)孝之终始	(136)
(四)父子相隐	(138)
三 “以孝友为政”	(140)
(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	(140)
(二)“以孝事君则忠”	(142)
第五章 礼论	(145)
一 “礼有三起”	(145)
(一)“礼理起于大一”	(146)
(二)“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	(152)
二 礼的本质	(156)
(一)“礼是体别”	(157)
(二)“礼者,体其情也”	(161)

三 礼的实践	(165)
(一)“礼贵得中”	(166)
(二)“礼以敬为主”	(167)
(三)“礼乐相须”	(168)
(四)“学礼立身”	(170)
 第六章 君子论	(173)
一 君子的内涵	(173)
(一)先秦君子观述评	(173)
(二)《论语义疏》中的君子内涵	(175)
二 君子之道	(185)
(一)善人之道	(185)
(二)先王之道	(187)
(三)“通而不壅”之道	(195)
 第七章 皇侃思想的哲学史价值	(202)
一 对先秦以来儒学传统的继承	(202)
二 对后世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	(204)
 结 语	(208)
 附录一 《论语义疏》研究述评	(213)
附录二 皇侃《论语义疏》与朱熹《论语集注》相合考	(226)
 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3)

绪 论

一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流，而儒学的基本典籍则为群经。自古以来，宗经之论，隆盛不衰。如南朝梁刘勰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①《四库全书总目》亦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经部总叙》）此类宗经之论大致相通。经为垂范后世的“圣典”，虽其内容博杂，但无非展现了儒家思想中强烈的政治、伦理、文化等教化功用，其小可以规范文章、教化人伦，其大可以经国治世。如孔子所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乐记》）此为“六经”之教。据此，“圣人之志，籍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②，儒家“群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灿然可知矣！

洎乎两汉，儒经注疏之风日炽。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展示注疏者当下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无不蕴藉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状况与学术风气。

^① 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说明：在以下注释中，凡援引常见史书及其他古籍均采用文中加注的形式；其他相关文献则采取首注详细标明作者、书名、出版社、时间、页码（或卷数）。

^② 纪昀：《诗序补义序》，《纪晓岚文集》第1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引文标点略作改动。

以此而论,研究儒经注疏不仅能体贴圣人言教,入群经之雅殿;也可以揭示注疏者的思想,洞察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状况。此亦本书选择围绕皇侃疏经著作研究其思想的动机与目的之所在。就具体研究而论,厥有二焉:

其一,皇侃著述主要有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孝经义疏》。^①汉代以降,《礼记》辑成^②,《论语》入经^③,《孝经》受崇^④,“三经”即为经中“显学”,为历代所重,褒评不已。典型之论如《礼记》之评,程颐云其“有圣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谬之说。乖谬之说,本不能混格言,只为学者不能辨别,如珠玉之在泥沙”^⑤;陈澧视之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⑥。《论语》之评,赵岐云其为“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⑦,陈澧云“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之中”^⑧。《孝经》一书,《汉书·艺文志》以为“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邢昺云其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⑨。故而考察皇侃经学著述既可以探赜皇侃思想,也可以体贴“三经”

① 详见第二章“皇侃生平、著作及学术背景”。

② 参见王锴《礼记成书考》第四章“《礼记》的成书及其在东汉的流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 《论语》何时入经?在当代学者中存有三说:一是汉代入经。以周炽成为代表(见周炽成《〈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现代哲学》2008年第5期)。二是宋代入经。以秦晖、李零为代表(见秦晖《〈论语〉是怎样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年7月2日;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07年4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讲演论题。演讲云:“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十三经在宋代出现,显然李氏持此说)。三是元代入经。以蒋非非为代表(见《流传千载的一句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3日。该文认为:“《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孝经》、《论语》只称“兼经”,宋与唐同,元时《四书》取代了《九经》的地位)。实际上,在汉唐之际出现的“七经”、“九经”、“十二经”说,均围绕《论语》的入经问题,存在诸多异说(参见周予同《群经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5—7页;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页)。从历史记载看,在西汉时,《论语》的地位就相当突出了。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帝时即立《论语》博士。《汉书·艺文志》将《论语》与《易》《书》《诗》《礼》《乐》《春秋》并编,列入六艺类。西汉《论语》类著述至少有15种之上(据王凯鹏《历代论语著述综录》第2章,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故据实情而论,西汉时《论语》已被视为“经”。

④ 虽然“汉时传《论语》、《孝经》者,皆他经大师,无以此二书专门名家者”,但是“《论语》《孝经》之传,实广于五经也”(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2页)。

⑤ 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0页。

⑥ 陈澧:《礼记集说序》,《四库全书珍本·九集》第38册。

⑦ 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

⑧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⑨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之教。

其二,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素来多认为皇侃为梁时著名的经学家,对其著作的研究也往往置于经学研究的架构中,侧重揭示其注疏特点,甚少能深入文本,探究皇侃本人的思想,这也导致学术界得出一些印象式的评价。如云“皇氏元(玄)虚之语尤多”,或云“所解怪异不经”,又或云“皇疏认为魏晋至南朝的玄学是对孔子精神的继承和发扬”,^①等等。然而,此类评价或论断,不仅存在判断上的某些偏失,也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皇侃思想产生了诸多误导。究其因在于上述“印象性”结论的得出,并不是以充分展现皇侃著作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缺乏理论检讨的深度,从而造成对文本的误判。因此,本书期以通过研究,较为系统地揭示皇侃著作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还原一个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思想家皇侃。

二 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检讨

如上所言,以往学术界往往将皇侃视为经学家加以研究,故而检视前人深入研究皇侃哲学思想的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缺乏的。但是前人的许多研究也为从哲学的进路考察皇侃思想提供了基础性的成果,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成果突破了经学研究的框架,有效地揭示出皇侃的某些哲学思想。本书侧重揭示皇侃的哲学思想,故仅就与皇侃哲学思想研究相关的前人成果做一回顾与检讨。^②皇侃著作仅有《论语义疏》^③以完书存世,前人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此书而展开。故下述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检讨,也以《论语义疏》思想的研究为主。大致而言,以往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总体性的评价;二是哲学范畴的研究。

① 上述三处引文,分别见于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24页;董季棠《评论语皇侃义疏之得失》(下),《孔孟学报》1975年第29期;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② 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检讨,参见本书附录一:“《论语义疏》研究述评”。

③ 初时该书“疏”与“注”不相合,但传入日本后皇侃疏被割裂,并被散置于何晏《论语集解》各条之下(参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1页)。故本书遵从原初版本,不云“《论语集解义疏》”。行文时或称之为“皇《疏》”,或云“皇疏”。

(一) 总体性的评价

清季以来,学术界关于《论语义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思想总体性的评价之上。概言之有二:

其一,“以玄虚说《论语》”。此说认为《论语义疏》深受正始以来玄学(道家)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玄学(道家)特点或倾向。以皮锡瑞、陈澧、刘恭冕、吴承仕、钱穆等人为代表。皮锡瑞云:“皇侃《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① 陈澧云:“何注始有元(按:当为玄,避清圣祖玄烨讳)虚之语。……自是以以后,元(玄)谈竞起。……而皇氏元(玄)虚之说尤多,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② 刘恭冕云:“梁皇侃依《集解》为疏,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③ 吴承仕云:“自何氏《集解》以迄梁、陈之间,说《论语》者,义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遗风,标玄儒之远致,辞旨华妙,不守故常,不独汉师家法荡然无复存,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皇氏本通《三礼》,尤好玄言,故其为《论语疏》,颇采华辞以饰经说。”^④ 钱穆亦云:“有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⑤ 此类论述,也广为现代学术界所认同。戴君仁、董季棠、孙述圻、牟钟鉴、宋钢等进一步立足于文本分析,深化上述观点。^⑥ 甚至此说在当前学术界也被一些学者推演为“玄学主旨”论。如云:“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方面,《论语义疏》则建立了玄学化的经学理论体系。”^⑦

其二,“持佛理以解儒书”。此说揭示了《论语义疏》深受佛教的影响。以陈澧、黄侃、陈寅恪等人为代表。陈澧云:“皇《疏》云:‘外教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3页。

②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23—24页。

③ 刘宝楠:《论语正义·后叙》,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7页。

④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6页。

⑤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9页。

⑥ 参见戴君仁《皇侃〈论语义疏〉的内涵思想》,《孔孟学报》1977年第21期,第15—29页;董季棠《评论语皇侃义疏之得失》(下),《孔孟学报》1975年第29期,第186—189页;孙述圻《论皇侃的〈论语义疏〉》,载林庆彰主编《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上册),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8—611页;牟钟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上册),第469页;宋钢《六朝论语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4—198页。

⑦ 张文修:《皇侃〈论语义疏〉的玄学主旨与汉学佛学影响》,《燕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无三世之义。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此用佛氏语说经，殊乖说经之体。且谓周孔为外教，尤非儒者之语矣。”^① 黄侃云：“皇氏《论语义疏》所集，多晋末旧说，自来经生持佛理以解儒书，殆莫先于是书也。其中所用名言，多由佛籍转化。”^② 陈寅恪亦云：“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熏习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③ 继后，张恒寿、董季棠、孙述圻、唐明贵等进一步将皇疏与佛典加以多方面的比较，深入佐证此说。^④

检讨以上论述，关于《论语义疏》思想的总体性评价，集中于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玄、佛倾向，基本上不涉及深层的义理分析。故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过度”性的评价。事实上，此类研究与学术界以经学的研究范式解读文本密不可分：在对文本进行了文字章句、体例结构等分析之后，得出某些结论。此类结论也多停留于表层性地甄别其中融混的三教思想乃至间杂的阴阳五行学说。^⑤ 一如高获华所评价：“关于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研究，一直较偏向于外围的考据以及认为其杂染佛、老思想所起之批评。”^⑥ 高氏之论，切中肯綮！

（二）哲学范畴的研究

较之总体性的评价研究，学术界关于皇侃哲学范畴的研究相当薄弱。据笔者寓目所及，采取哲学进路（或侧重思想揭示）的研究性重要论著，仅有高获华的《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研究》、周丰堇的《皇侃性情论——〈论语义疏〉性情思想探讨》、邱培超的《皇侃〈论语义疏〉之礼学观》等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24页。

② 黄侃：《汉唐玄学论》，《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6页。

③ 陈寅恪：《论语疏证序》，《论语疏证》，《论语》（四部要籍注疏丛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85页。

④ 参见张恒寿《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教影响》，张恒寿：《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410页；董季棠《评论语皇疏之得失》（下），《孔孟学报》1975年第29期；孙述圻《论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上册），第612—616页。

⑤ 董季棠：《评论语皇侃义疏之得失》（下），《孔孟学报》1975年第29期。

⑥ 高获华：《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研究》提要，“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1990年硕士论文。该文于2007年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研究深受其启发，借鉴处较多，谨作说明并致以谢忱。

寥寥数文^①，但是上述诸文均得出了一些创见，尤其是高文。故就其中的创见略而析之：高文紧密围绕《论语义疏》中的“性”、“命”、“仁”、“道”、“德”五个哲学范畴展开论述，其突出创见大致有三：一是认为皇疏中的“性”为“禀气之性”，具有“无善无恶”的特质，不具有先天超越性。人的价值彰显亦不在于性，而在于德行实践。二是揭示皇疏中的“仁”有“仁性”（个性特质）与“行仁”（行为实践）两种面相，而又重在阐发“利他”、“施予”、“付出”的“行仁”实践。三是认为皇侃通过由“道”而“德”而“仁”的思考进路，关注人的个体理想实现与在群体中立身处世之间的问题。周文的创见则在于揭示出皇侃性情论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全生之谓性”与“情之谓成”。“全生之谓性”，未涉乎用，是先天之生，不能用善恶来说明。而“情之谓成”则涉乎用，进入了后天经验领域。故认为性无善恶，情也无所谓善恶，但是情的活动却有邪正。邱文则从“礼理起于大一”、“圣人以人情制礼”、“中庸原则的实践”、“礼乐与家国社会的关怀”等方面对皇侃礼学思想做一概述。

检讨以上论述，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成果不多，系统化、深入化的成果更为缺乏，但是在上述成果中最为突出的贡献当是认识到“性”在皇侃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下仅就上述高获华、周丰堇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论其数端：其一，揭示了皇侃“性”论中“性无善恶”的特质，但又存在较大的分歧，是高氏所谓的气性论，还是周氏所谓的至善全性，尚需进一步甄别。其二，虽然在上述研究中，或揭示玄学（道家）性论，或揭示汉代气性论对皇侃思想的影响，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性论纷沓而出，各种论“性”进路与方法亦频频出现，故而对皇侃性论的哲学史资源的揭示，尚需深入研究。其三，关于“性”与“情”的关系。高氏未见详述，而周氏所谓的先天之性无善恶，情也无善恶；但后天之情却又存在活动上的邪正，性情关系仍存在一定的

^① 周丰堇：《皇侃性情论—〈论语义疏〉性情思想探讨》，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期刊网；邱培超：《皇侃〈论语义疏〉之礼学观》，载《第三届儒道国际学术研讨会·魏晋南北朝》（2007年刊印）。此外，尚有个别论著也做过一些相关分析，诸如强昱《简析皇侃〈论语义疏〉的性情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对皇侃性情问题略作分析；桂文灿《论语皇疏考证》（《丛书集成续编》第13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皇侃论语义疏跋》（张维屏：《学海堂三集》卷13，清咸丰九年启秀山房刊本），章凤翰《皇侃论语义疏跋》（《学海堂三集》卷13，清咸丰九年启秀山房刊本），陈澧《东塾读书记》，乐胜奎《皇侃与六朝礼学》（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对皇侃礼制思想也做出某些揭示。

隔绝。若确如周氏所判分的性情论,则如何看待这一“鸿沟”?若非周氏之说,其性情关系又当如何?这也需进一步做考察。其四,《论语》中“仁”为最核心的哲学范畴,皇侃如何诠释这一范畴及其与“礼”、“性”、“情”等哲学范畴的关系。若如高氏对仁进行的“仁性”与“仁行”的划分:一为先天特质;一为后天实践。二者的关系如何?二者又是如何转化的?与其他哲学范畴关系如何?等等。对此仍需进一步的考察。其五,在《论语》中,“礼”是仅次于“仁”的哲学范畴。作为南朝时著名的礼学家,皇侃又著有《礼记义疏》。皇侃是如何诠释“礼”的?礼的性质、功用乃至礼与仁、礼与乐的关系又如何?面对汉魏以来,学术界普遍受到郑玄、王肃礼学之争的影响,皇侃礼学是如何回应这一礼学思潮的?其六,“孝”不仅是《论语》《孝经》的重要范畴,也是皇侃生命践履和理论阐述中的重要关注点,皇侃是如何阐述“孝”的?“孝”与其他哲学范畴的关系又如何?其七,君子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人格形象,为历代《论语》注释者所重视,而学界在解读皇侃《论语义疏》时往往则重其圣人形象,忽略对其君子人格的研究与探讨,更鲜有人问津圣人与君子的关系如何?君子观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些在当前学术界也鲜有问津。

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需要吸收和反思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揭示皇侃主要哲学范畴的内涵,而且需要进一步考察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皇侃与皇侃之前已有的哲学思想的关系,以期达到较系统地呈现皇侃思想体系的目的。

三 研究方法 with 思路

基于上述,本书的研究试图把哲学史与哲学都看作“发展中的系统”,注重“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①的;同时,又突出哲学史与哲学概念的互动,既要从哲学史的发展中看待哲学范畴的嬗变,又要从哲学范畴的嬗变中反观哲学史的发展。落实到皇侃思想的研究上,拟采取三种研究方式:

其一,在探讨皇侃思想中的哲学范畴时,注重将研究视域置于各个哲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页。

学范畴的发展史中,探论皇侃思想的理论来源、动机及其目的,乃至皇侃思想中各个哲学范畴之间的联系,以期较为系统地呈现皇侃的思想体系。

其二,在进行哲学范畴的探讨时,本书拟采取比较的方法揭示皇侃与前代、后世学者对同一文本分析的异同,进一步呈现皇侃思想的特点及其学术史价值。

其三,在研究中,立足于文本,兼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分析、辨别异说,以期做出合理的判断。

本书研究思路体现于以下章节的安排上:

第一章“皇侃生平、著作及学术背景”,揭示皇侃生平中影响其思想形成的人物及重要事件,梳理其著作的存佚情况。并从学风嬗变与学术实践两方面对皇侃思想形成的学术背景做出考察,以期揭示其思想形成的学术氛围。又从体式、语言、思维方式等方面揭示皇侃现存著作《论语义疏》的阐释特征,及其阐释特征对皇侃哲学思想建构的影响。

在第二、三、四、五章中,通过较为系统地梳理皇侃论“性”、“仁”、“命”、“情”、“孝”、“礼”的言论,以期深层次地揭示这些哲学范畴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皇侃的思想体系。

第六章“君子论”,揭示皇侃思想中君子的不同义项,及其“君子之道”。“君子”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人格形象和儒学成德之教的重要目标,从这种意义上看,皇侃对君子的解读反映了其儒学观。

在第七章与“结语”中,揭示皇侃思想的哲学史价值,并对皇侃思想做一回顾。

附录一“皇侃《论语义疏》研究述评”,主要评述关于该书的流传、版本辨伪、内容校勘、注疏特点、思想阐述等方面的研究,以期对清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做一回顾与检讨。

附录二“皇侃《论语义疏》与朱熹《论语集注》相合考”,通过逐章对比二书,期以解决清季以来,学术界关于朱熹是否受《论语义疏》影响的公案。

第一章 皇侃生平、著作及学术背景

一 皇侃生平及著作

(一) 生平

《梁书·皇侃传》云：

皇侃，吴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侃少好学，师事贺瑒，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梁书·武帝本纪下》又云：

（大同三年）冬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由上可知，皇侃生平事迹较为简略，值得注意处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皇侃生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卒于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享年58岁。虽然其生年横跨齐、梁二代，但是自其发迹至病卒均在梁武帝时期。这一时期皇侃度过了其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以国

子助教的身份讲学，闻名于世；且受到梁武帝的善待，曾被召入寿光殿讲《礼记》，擢迁为员外散骑侍郎。因母丧丁忧，解职还乡。后又受到皇子平西将军邵陵王萧纶的礼遇。萧纶为梁武帝第六子，在大同六年（540）二月至大同七年（541）二月间为平西将军^①。故据《皇侃传》云“平西邵陵王”知，皇侃受其礼遇也当在此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父子均为饱学之士，并以其政治权势影响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②梁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常与群臣辩释经籍（《梁书·武帝本纪下》）。据《隋书·经籍志》载，有关梁武帝的著作，除沈约所注的《梁武帝连珠》、邵陵王纶及陆缅所注的《梁武帝制旨连珠》外，其本人著作多达24种，694卷，涉及《周易》《礼记》《毛诗》《中庸》《尚书》《孝经》《老子》、“兵法”等诸多方面。^③同时，梁武帝又“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梁书·武帝本纪下》）。其子邵陵王纶也熟通三教经典，曾自讲《大品经》（见《南史·马枢传》），《隋书·经籍志》亦载录《邵陵王纶集》六卷^④。据此而论，皇侃能被二人称善、钦服，足见其学识斐然，推步于当时学林！

其二，皇侃先九世祖为皇象，曾为青州刺史。历代关于皇象的史料十分简略：《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张勃《吴录》云：“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逋连，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唐窦蒙《述书赋注》又云：“皇象，字休明，广陵人。终侍中，吴青州刺史。”可见，史书有关皇象生卒年^⑤及其事迹多不详，但载其在三国时期以书法著称于世，后世亦论其“草书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张怀瓘《书断》），

① 《梁书》卷3《武帝本纪下》：“（大同六年）二月己亥，舆驾亲耕籍田。景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西将军、郢州刺史，云麾将军豫章王欢为江州刺史。……（七年）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故知，大同六年（540）二月邵陵王萧纶始任平西将军，而至大同七年（541）二月则为梁弥泰所代替。

② 参见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1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442页。

③ 《梁书·梁武帝本纪下》载有《制旨孝经义》等200余卷，文集百廿卷，与《隋书·经籍志》有出入。

④ 《隋书·经籍志》载有《邵陵王纶集》6卷，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四卷有出入。

⑤ 朱世源考证皇象生卒年约为195—278年，“存世最多八十四岁”。参见朱氏著《扬州历代书法考评》，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文而不华，质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书圣’称”^①。虽然皇象之后，皇氏家族或有所衰落，但是此类家世在重视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堪为高门、名门。从时代风气看，梁武帝在其受禅登位之前，即上表批评“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梁书·武帝本纪上》）的现象，力图维护门阀贵族的纯洁性。天监五年（506）又下诏云：“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梁书·武帝本纪中》）可见，梁武帝长期坚持在政治上优待以往的门阀子弟。故而在此种时风之下，皇侃较有可能享受到贵族子弟的优容与自由，也应具备较好的求学和治学条件。再从文化传承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文化“莫不寄存于门第之中，由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以生长有发展”^②，而以孝道为基本伦常的儒家礼教，是维持门第社会的重要文化因素。据此，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则可见其深受时风影响而信守儒家礼教。

其三，皇侃曾师事大儒贺场，精通三《礼》《孝经》与《论语》。据《梁书·贺场传》知，贺场（字德珪，452—510）承续家学，善三《礼》。在天监初年，即为梁武帝所器重，召其讲说《礼》义。至天监四年（505），梁武帝设立国学，诏开五馆，以五经教授，并各置五经博士一人。是时贺场即与明山宾、陆琰、沈峻、严植之各主一馆；并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写《五经义》。其著作有“《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梁书·儒林·贺场传》），未见其撰有《论语》著述；但记其子贺革时云“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梁书·儒林·贺场传附传》）。据此看，贺场亦应治《论语》。而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又屡屡称引“师说”。据此亦可知，皇侃受贺场影响至深。

综上，皇侃以其出身及与梁武帝、邵陵王、贺场的机缘，不但影响了皇侃的生平境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皇侃哲学思想的形成。换句话说，包括《论语义疏》在内的皇侃著作的成书也应与上述

① 潘运告主编，桂第子译注：《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②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198页。